

以史解画，以图证史

——关于光绪《大婚图》册的绘制

任万平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套光绪《大婚图》册：一套为底稿本；一套为进呈用于审定的细稿本；一套为最终进呈御览定本。三套图册所绘礼节程序相同，具有纪实性特点，但其绘制并非是在典礼结束后的实景记录，而是在婚礼之前就预绘出底稿，再根据实景予以修订，因为大婚礼节程序具有标准化的特点，可以支持这样的操作。光绪《大婚图》册，每套九册，堪称鸿篇巨制，其创作由庆宽领衔，集体绘制而成。庆宽画史无传，出身于低微的内务府员外郎，作者认为，其宦海沉浮亦有明晰之必要。

关键词 大婚图 清代 御览定本 纪实 庆宽

故宫博物院一共收藏有三套光绪《大婚图》册（以下简称《大婚图》），此图现今引用较多，但有关此图的形制、绘制情况、作者的解析，资料比较零散，研究或有不清，笔者拟在此作进一步的梳理、对照和解析。

一 《大婚图》概况

故宫博物院所藏三套《大婚图》册，均为蝴蝶装，尺寸规格基本相近。每套册数相同，均为九册。首册《懿旨》：节录慈禧皇太后关于光绪帝大婚的相关懿旨6页、大婚典礼全图目录2页；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皇后出宫至邸第图7页、图说3页；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纳采礼图12页、纳采宴图3页、图说13页；第三册《大征礼图》：大征礼图13页、图说11页；第四册《皇后妆奁图》：皇后妆奁图7页、图说1页；第五册《皇后凤舆入宫图》：皇后凤舆入宫图17页、图说9页；第六册《册立奉迎图》：册立奉迎图16页、图说6页；第七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庆贺颁诏图5页、赐宴图2页、图说4页。

三套《大婚图》册，分别编为新187874号、故5886号和故5887号。前两套明显是画稿：新187874号，本文称为底稿本；故5886号，较前者绘制精细，称为细稿本。故5887号，绘制最为精细，而且题签用黄色，明显是进呈御览之本，称为正本。本文全面铺排并予以解释的即正本故5887号。

两套冠以故字号的图册，为清宫遗存。《大婚图》正本绘成后，存贮在内廷乾清宫西暖阁^①，在1921年应为懋勤殿提出过^②，因为逊帝溥仪要举行婚礼，观览此图可能是为了再现当年光绪皇帝大婚的排场。

故5887号《大婚图》，参考号是霜字号799-806，即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溥仪被驱逐出宫后点查宫内各宫殿物品给予的千字文编号。查霜字号799-806，在《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三编第三册“养和殿”第八页有：七九九 皇后出宫至邸图(第一册)、八〇〇 纳采礼筵宴图(第二册)、八〇一 大征礼图(第三册)、八〇二 皇后妆奁图(第四册)、八〇三 皇后妆奁图(第五册)、八〇四 册立奉迎图(第六册)、八〇五 皇后凤舆入宫图(第七册左开)、八〇六 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第八册)。接下来才是八〇七 懿旨，实际上“懿旨”是《大婚图》的首册，故5887号的参考号实际应编为霜字号799-807，所以，后来在参考号霜799-806号外，又增加了一个伟7308号^③。养和殿指储秀宫的东配殿。

故5886号《大婚图》参考号是伟字号，没有对应的紫禁城存贮宫殿，是文献馆南迁文物所给予的号码(给以伟7680-82、7678-79、7410，但这组伟字号实际只有6个号码，仍没有完全涵盖九册)。在该图册的木夹板上贴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标签，登记号为“图71:7”。故5887号也曾是文献馆南迁文物，文献馆标签登记号为“图70:6”。故5886、故5887两套《大婚图》，在每一册的前或后附页上钤盖“教育部点验之章”^④，也再次证明这两套《大婚图》均曾有过“南迁”经历。

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中，在“南三所”^⑤处见有《大婚图》九册^⑥。既然在养和殿存贮的是故5887号，那么在南三所存贮的就应该是故5886号，南三所区曾是故宫文献馆所在地。

冠以新187874号这一套《大婚图》，1958年3月10日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拨交故宫博物院，由冯华鉴定，作为文物入藏，当时编号为新68077，命名为《清人画光绪大婚礼全图》，后不知何时销号降为“资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分为四个等级，即一二三级和“资料”，一二三级属于国家珍贵文物，“资料”对应于国家文物定级中的一般文物。1980年，该作品再升为“文物”，重归国家定级中的珍贵文物之

① 光绪二年三月初四立乾清宫《西暖阁陈设档案》，故宫博物院藏。在其续添条记载“光绪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懋勤殿，大婚典礼全图二匣，计九册”，指此图绘制完成后，由懋勤殿首领太监交到乾清宫西暖阁存贮。

② 宣统貳年捌月貳拾肆日立乾清宫《西暖阁现设档》，故宫博物院藏。在续添的年份中，其中有一黄条书“宣统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懋勤殿，大婚典礼图二匣计九册”。

③ 伟字号文物是文献馆南迁文物清点时的补号。故宫博物院文物主要编有故字号或新字号。1949年之前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编号，以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各个宫殿内文物用千字文编号为主。后来对漏编的与其他来源的文物也给以不同字头的编号。文献馆指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伊始的业务机构之一，初设在图书馆之下称文献部，后独立为文献馆，管理除立体古物、图书之外的文物。南迁文物是指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华北，为避战火对文物的破坏，将故宫文物向上海以至后来的南京再向西南迁移避难过程中的文物。

④ “教育部点验之章”，篆书阳文长方印章，一大一小。1934年11月—1937年6月对故宫南迁存沪文物进行点验时以此做印记。

⑤ 南三所位于紫禁城外东路，在宁寿宫之南，是清代皇子的生活区。

⑥ 《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第四编第三册，民国十八年(1929)再版，故宫博物院刊印。

〔图一〕底稿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新187874



〔图二〕进呈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故58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聚首于典礼的发生之地——紫禁城，它们一并成为今人乃至后人回望封建时代传统婚姻的标本。

二 三套《大婚图》的画面差别

新187874号《大婚图》，绢本，纵63.7厘米，横114.2厘米。图册部分细节特征如下：1. 三册中其画面最为简疏。所有页面的天空祥云都绘制得一片混沌〔图一〕，而正本则是云卷云舒〔图二〕。2. 有的建筑整体并未勾画，只勾画部分示意。如第四册《皇后妆奁图》中的中和殿、保和殿〔图三〕，或者减省非主体建

列，重新给以新187874号。这一套《大婚图》作为粗稿本，应该是进呈给醇亲王奕譞^{〔1〕}审定的稿本，得到俞允后，可能清末以来收藏在醇亲王府邸。尽管醇亲王奕譞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薨逝，但此时该稿本已绘制完成（下文述及）。这个醇亲王府里出了一位至尊的皇帝，而且这套图画是绘制这位皇帝的大婚典礼，图画又是该亲王督责绘制，其意义对于醇亲王府而言，可谓至宝，自当“子孙永保”。民国之后，前清各王府随着皇权树倒而飘零败落，府中之物也散佚民间。不知几经辗转是什么渠道，使这套《大婚图》归入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在1958年由该机构拨交给故宫博物院。前世皇朝时代的《大婚图》三“兄弟”，在中

〔1〕 奕譞（1839—1890），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生父。同治十一年封为醇亲王。

筑，如景山后街只见景山内的寿皇殿一隅，而不见东北角的集祥阁与山上亭子，东西雁翅楼多处被混沌云雾遮挡不画〔图四〕。3. 每开画面的人物与建筑，最后贴以白色纸质签条作为标注(参见〔图一〕)。实际上，最初所贴签条为黄色，后来全部在上面重新用白色签条覆盖黄色签条，因为此图不是进呈给皇帝与皇太后审阅之本，不可僭越用黄色，后更改为白色。仔细观察可见补贴的白色签条边缘，露出黄色，如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在画面下方的“工部司员”签条露有黄边，在其右侧还有遗漏用白色签条覆盖的黄签“内务府官”〔图五〕；在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上，其中在太和殿内绘有“节案”，覆盖的白签没有贴实，虚浮起来最为明显〔图六〕。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奉王爷谕……今将绘妥出宫图正册，谨呈钧阅，并请示题说一节，拟用黄绢书写，至图上所贴黄签，可否写在图上，勿庸粘贴之处未敢擅便，伏候批示遵办”^{〔1〕}。从这条

〔图三〕底稿本第四册《皇后牧夜图》



〔图四〕底稿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五〕底稿本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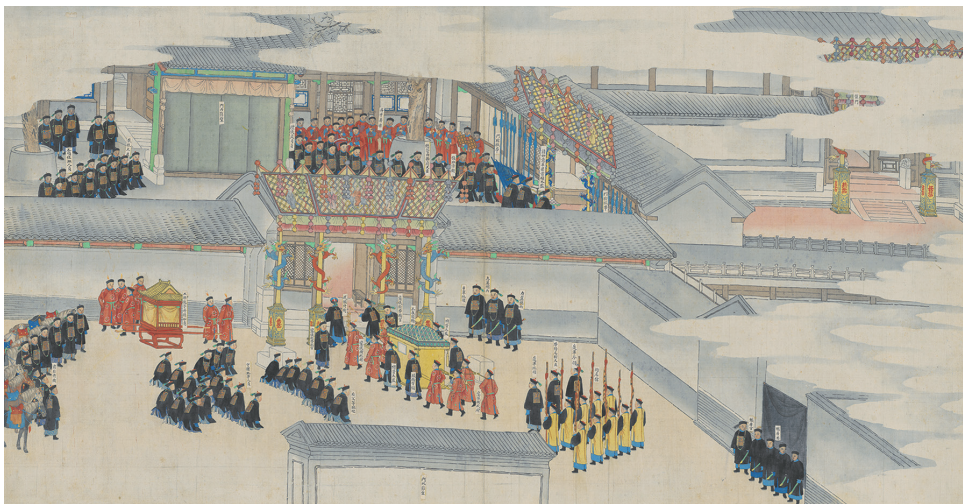


〔1〕 旧整《宫中杂件》第238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六〕底稿本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



〔图七〕底稿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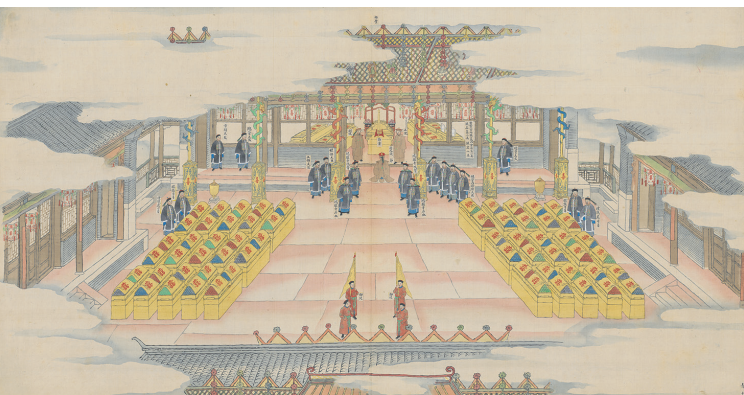


〔图八〕底稿本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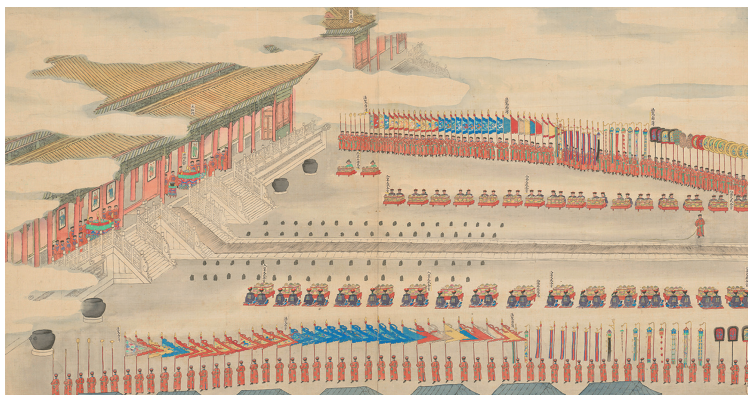


档案可知，只有正本才可用黄签，底稿本不能僭越用黄签，而且从遗存实物可知，黄签没有钦准不能直接题写在图上，而是粘贴。4. 同一空间内不同的礼仪程序，画面基本相同，但同一局部细节绘制不同，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准皇后礼舆进入皇后府邸一开，内院影壁墙上省写了“泰运延釐”四字〔图七〕，但在第二、三册中则有书写〔图八〕。这也说明底稿本粗简，并不完善。5. 白签题写错误。第三册《大征礼图》画给皇后的礼物，本为白银一万两，题签错写为“白银二万两”〔图九〕。6. 凉棚数目错误。第八册太和殿筵宴画面，丹陛下（画面的下方），御道之东卤簿仪仗外绘蓝布凉棚七座，实际应为八座，少绘一座，御道之西卤簿仪仗外面竟然未绘画一座蓝布凉棚〔图十〕。7. 代表帝后的标志性符号龙、凤示意性突出。如在各处架彩柱子上缠绕的龙，不仅没有龙鳞而且龙爪只是四爪〔图十一〕，四爪不能称龙只能称蟒，为亲王使用而非皇帝使用；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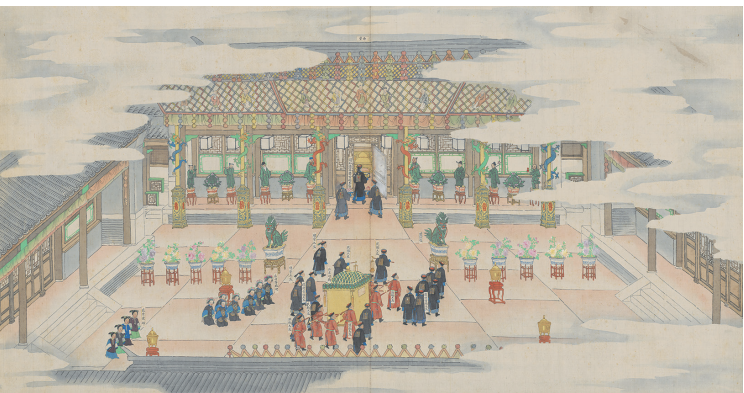
〔图九〕底稿本第三册《大征礼图》



〔图十〕底稿本第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



〔图十一〕底稿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十二〕底稿本第六册《册立奉迎礼图》



凤舆蓝轿帷上的金凤时绘时不绘，第六册《册立奉迎礼图》凤舆从太和门启行一开，凤舆蓝轿帷上未绘金凤〔图十二〕，第七册《皇后凤舆入宫图》，走在大清门外的凤舆蓝轿帷上绘有金凤〔图十三〕。8. 没出现皇帝形象，只在慈宁门下绘有拜褥。册立奉迎前、太和殿庆贺礼前，皇帝均须前往慈宁宫向皇太后行礼，这两幅画面，是《大婚图》唯有皇帝身影出现的画面，但在此本与故5886号上均未绘出皇帝〔图十四〕。9. 每一册的背面左上角有墨书册名简称加苏州码^{〔1〕}编号，如“大征×”……〔图十五〕，只不过此处的×是个草写的形式。10. 从婚礼的纳采开始，每一册给以顺序号，每一开画面(不包括图说)右下角(只有第七册在左下角)贴以墨书文字加序列编号的白色签条。即纳采册为“充一、充二……”〔图十六〕，大征册为“青一、青二……”，妆奁册一为“徐一、徐二……”(见〔图三〕)，妆奁册二为“扬一、扬二……”，册立奉迎册为“荆一、(荆二漏贴)、荆三……”皇后凤舆入宫册为“豫一、豫二……”(此册编号签在左下角，豫十漏贴)，庆贺颁诏赐宴册为“梁一、梁二……”充、青、徐、荆、扬、豫、梁几字，是《尚书·禹贡》中的“九州”九个字的中间七个字。古人有时用九州的九个字冀、充、青、徐、扬、荆、豫、梁、雍做排序使用，但不知本套稿本为何不用首尾两个字“冀”、“雍”，把九册依次排列。11. 画面割裂，在宫内行进的路线，人员走在棕毡上，但在太

〔1〕 苏州码，即苏州码子，是中国旧时表示数目的符号，也叫草码，用 丨 Ⅱ Ⅲ × 8 + = 三 夕 十 分别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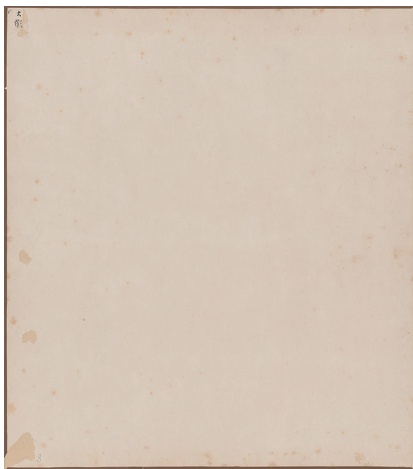
〔图十三〕底稿本第七册《皇后凤舆入宫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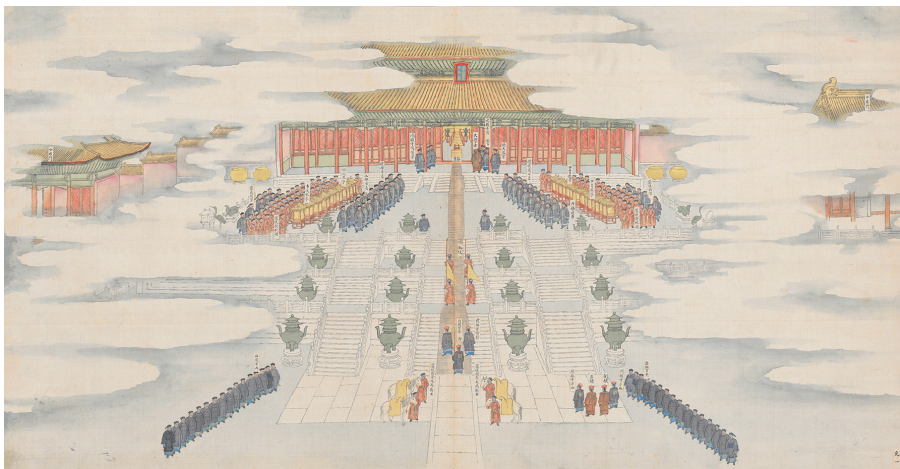
〔图十四〕底稿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



〔图十五〕底稿本第三册《大征礼图》袂裙



〔图十六〕底稿本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



和殿丹陛下绘有棕毡成为虚设，抬妆奁的人员并未走在上面〔图十七〕。

此本作为进呈给醇亲王奕譞所审阅的稿本，即第一稿，也就是底稿本，只勾勒出轮廓与示意。“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奉王爷谕，皇上大婚礼次第礼节全图，着归并画馆恭绘，至所需款项由粮饷处支领。谨查恭绘大婚礼全图，将出宫图、纳采图……图稿已先后呈览。奉懿旨著照图稿恭绘。”^{〔1〕}此处的王爷即醇亲王奕譞，是光绪皇帝之父，也是大婚礼仪处总负责人，呈请其审阅既在情理之中，也是职责所司，亦是皇太后慈禧的旨意。

第二套，编号为故5886，纸本，纵62.5厘米，横112.7厘米。每一开背面编号与底稿本相同，即用册名简称加苏州码。此套是经过多处修改后再绘制的细稿，画面上建筑与人物处题签已变更为黄签，其建筑与人物绘制已较精细。但此套图册最严重的问题是画面错乱：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与第三册《大

〔1〕 旧整《宫中杂件》第238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十七〕底稿本第四册《皇后救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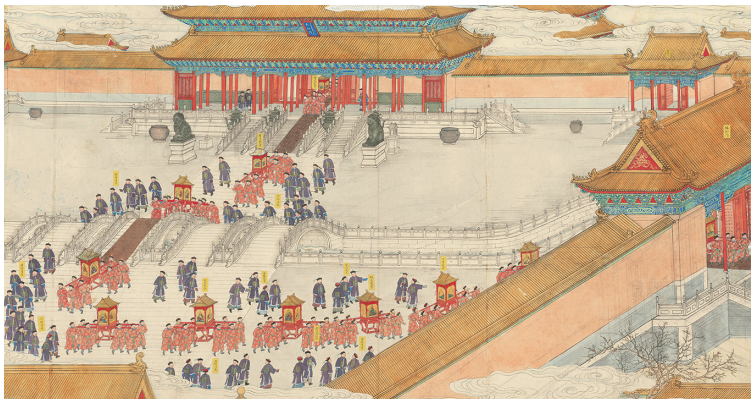
〔图十八〕底稿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十九〕底稿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二十〕底稿本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



征礼图》画面排列错乱，在第二册《纳采筵宴礼图》中，掺入了两开画大征礼的图像，其背面却墨书为纳采与苏州码编号；第三册《大征礼图》则又掺入六开纳采图像，背面却墨书大征与苏州码编号。而具体到每一开图册，又有多处修改痕迹与细节错误。1. 笔墨修改痕迹，主要是对建筑的修改。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绘景山后街有孔雀顶礼舆画面的一开，画面左侧空白处有建筑痕迹的笔道，应是原来把地安门的一角画入此处〔图十八〕；接下来的一开，对地安门以及它的东楼修改笔迹很明显〔图十九〕；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在协和门的南侧红墙上也可见修改痕迹〔图二十〕；第三册《大征礼图》，在东华门处对建筑进行修改的痕迹有丹陛的收短、铜缸后缩〔图二十一〕；第六册《册立奉迎礼图》，对在太和门丹陛下停放龙亭处的地砖进行了修饰，明显色白〔图二十二〕；第七册《皇后凤舆入宫图》对昭德门的修改痕迹更为突出，尤其螭吻部分最为明显，位置从画面的较中心位置向下移动，即原绘位置在御路西侧品级山^①以西〔图二十三〕。对建筑的修改，主要是位置比例不适，表明画馆画家对界画技法不够精熟。2. 人物修改笔迹遗痕与个别挖补痕迹。第三册《大征礼图》，文华门一开，在四匹马的下方有很多人物

① 品级山，乾隆中期以后是举行皇家大典时官员朝贺站位的标志物，以青铜制作，内腔中空，像山形，上书满汉文品级。

〔图二十一〕底稿本第三册《大征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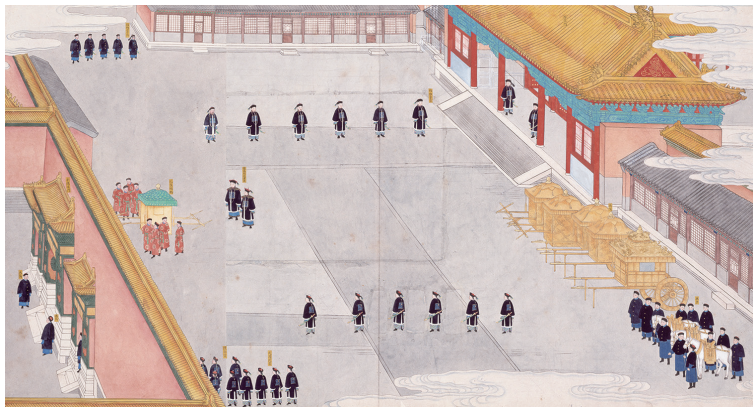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二〕底稿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



〔图二十三〕底稿本第七册《皇后风輿入宫图》



〔图二十四〕底稿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



的笔痕(参见〔图二十一〕)，实际这一开的画面内容不是大征礼，而应是混在此册的纳采礼图，因为只绘四匹马，不合大征之礼仪。第六册《册立奉迎图》，隆宗门外不仅有接纸，而且画面下方六个站班官兵处有三处挖补痕迹〔图二十四〕；太和殿丹陛上的副使挖补痕迹非常清晰见(参见〔图二十二〕)。在第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长信门之南，跪坐三排行礼大臣右侧的一处挖补也非常明显〔图二十五〕。

3. 题签不准确。如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地安门以南黄瓦墙(俗称内城墙，是皇城内区隔府库与衙署的墙)两处的“警卫”写为帐房官兵〔图二十六〕，这不是皇帝外出远行巡守需要行营与护卫帐房，何来帐房？所以正本均为“站班官兵”，即警卫值守官兵。第三册《大征礼图》，文华门题签先写为文华殿，后把“殿”字涂抹改为“门”字(参见〔图二十一〕)。

4. 图说缮写错误。最严重的是第四册《皇后妆奁图》，首开图说竟然错误地缮写为“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恭进皇后妆奁二百抬”〔图二十七〕，年、月及数量均错误，实际上，进皇后妆奁时间是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每一日进妆奁一百抬，但第五册图说二十五日进妆奁情景，已与正本一致，时间写为真正的进妆奁时间，即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另有图说书写错误，发现后对其进行过修改，如第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的图说，中间“朝服捧王以下文武”几字，经过修改处理〔图二十八〕。

5. 画面的简化处理。第六册绘使节到皇后府邸，其门

〔图二十五〕底稿本第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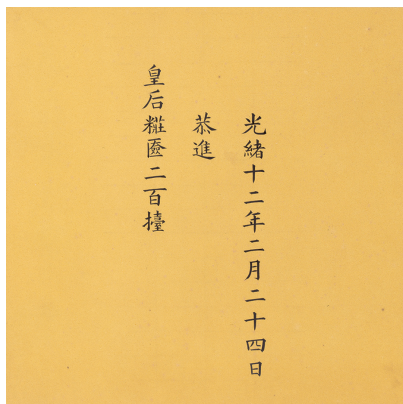
〔图二十六〕底稿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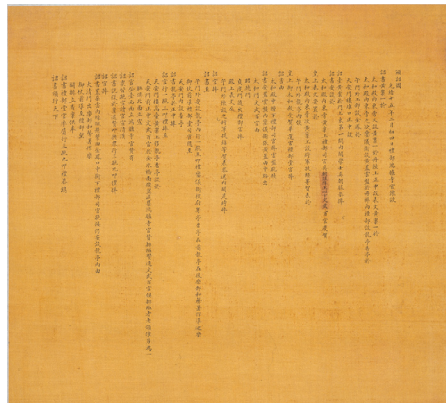
墙两边的墀头^①看面，不是告示而仅为红纸示意〔图二十九〕，正本所绘门墙两边的墀头看面上有封印开印告示〔图三十〕。光绪帝大婚册立奉迎时间在正月，可能尚在官府封印期间，而皇后父亲桂祥为八旗副都统，自应书写封印开印告示。

6. 建筑空间比例不适。第六册《册立奉迎图》册，在画面右侧，凤舆之下的庑房上全部画上了架彩，实际上，它应是两道门的架彩，但把后一道门与前一道门叠加在了一起，架彩就画到了侧翼的围房建筑上〔图三十一〕，正本的这个画面就很明晰〔图三十二〕。7. 建筑名称题签粘贴位置随意。从第五册《皇后妆奁图》上可见，“中和殿”签贴在门扉上，“保和殿”签贴在墙壁上〔图三十三〕，而正本的字签则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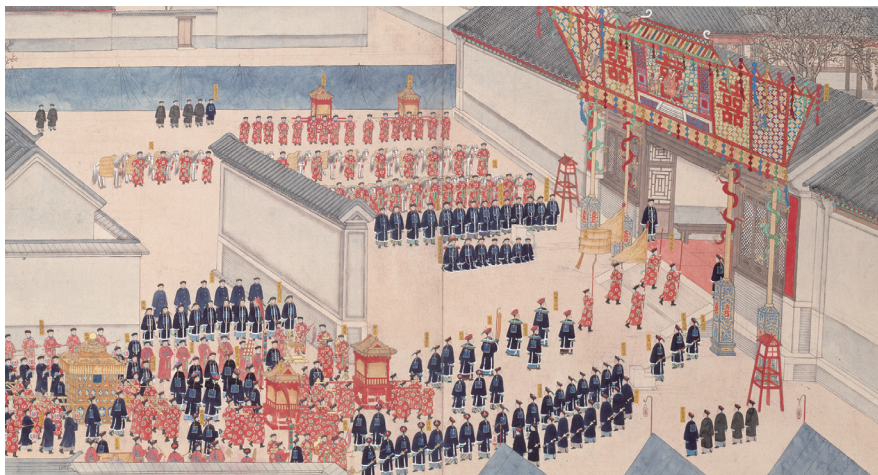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七〕底稿本第四册《皇后妆奁图》图说



〔图二十八〕底稿本第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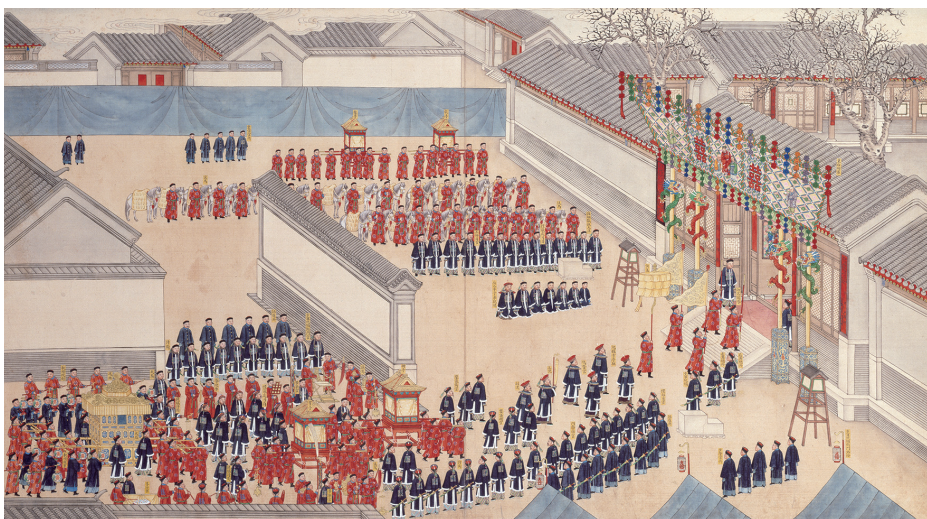


〔图二十九〕底稿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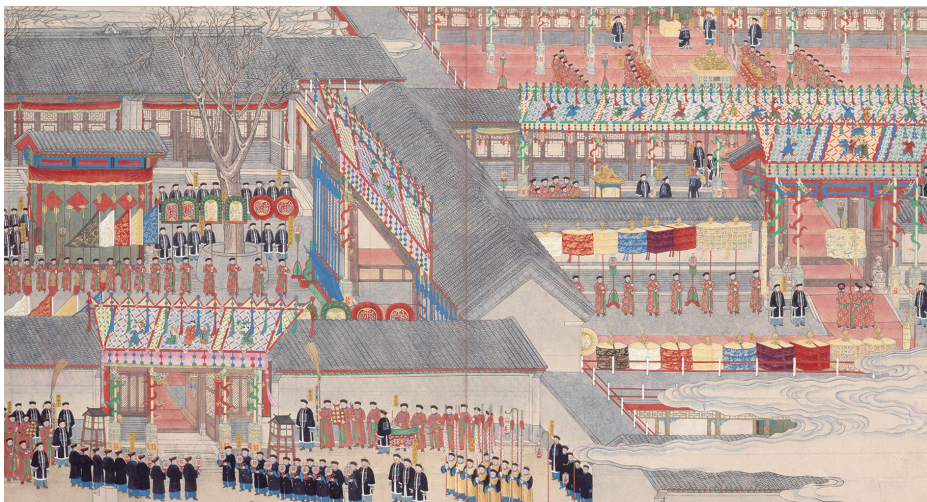


① 墀头：指山墙伸出至檐柱之外的部分，突出在两边山墙边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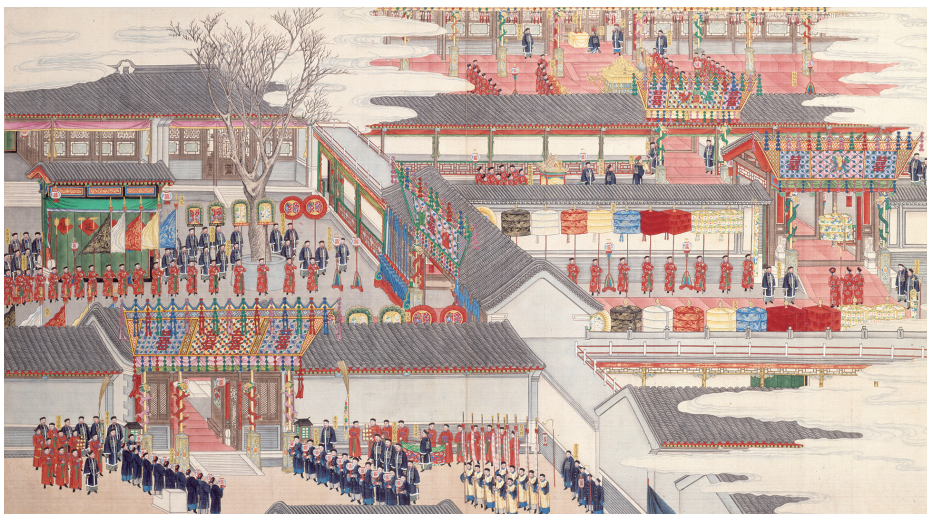
〔图三十:1〕进呈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



〔图三十一〕底稿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



〔图三十二〕进呈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



〔图三十:2〕进呈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局部



贴在屋顶的琉璃瓦上。

按以上所揭之情形，此本《大婚图》册应是对底稿本的具体化，先是形成二稿轮廓，然后在二稿轮廓的基础上再修改，着色，所以多处可见修改痕迹。全部题签均已改为明黄色，这应是进呈给皇太后与皇帝预览(也是御览)的稿本。

第三套，编号为故5887，绢本，纵65厘米，横115厘米，系进呈御览的正本。该本画面上题签全部为明黄色，在每开背面接近左上角位置亦贴有题写本册题名简称与顺序的明黄色签条，如“奉迎图第三”〔图三十四〕签条上墨色楷体书写工整。本套画面布局合理，绘制精细，没有任何修改痕迹，图说缮写符合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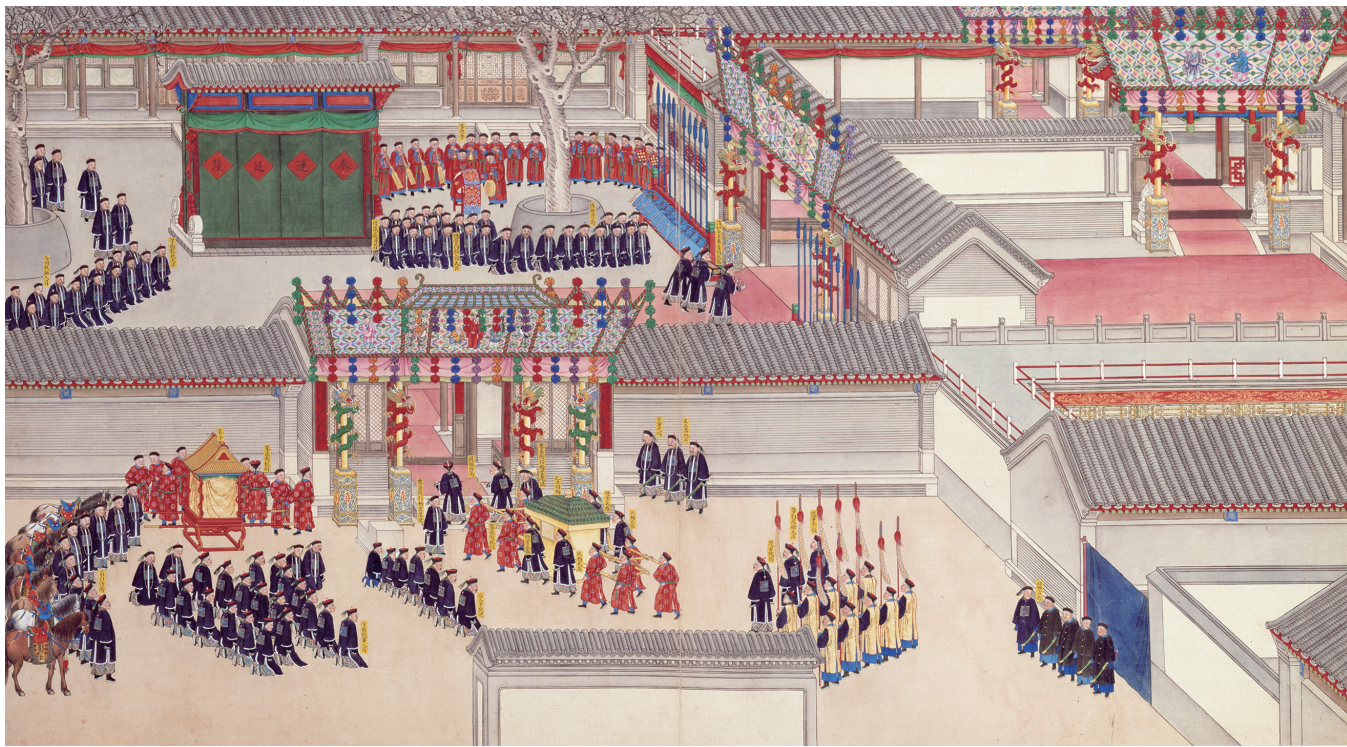
〔图三十三〕底稿本第五册《皇后妆夜图》



〔图三十四〕进呈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裱褙



〔图三十五〕进呈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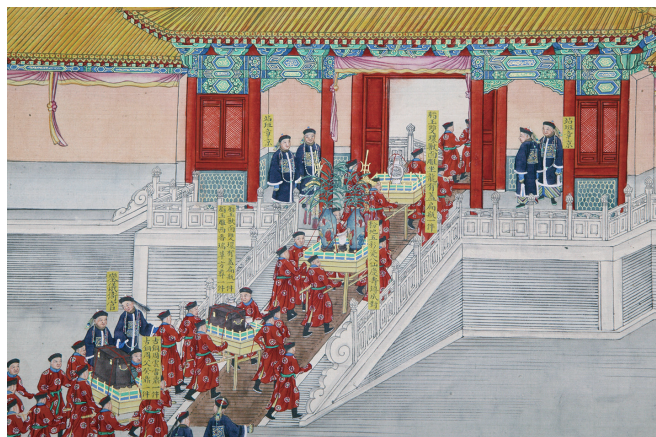


实际。但本套图册也有个别瑕疵。1. 细微处绘制有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情况。如在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上，将皇后府邸门墙墀头看面上用红纸书写了封印开印告示〔图三十五〕。其实指立皇后，出宫回府是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这个时间与封印开印时间毫不相干，因为清代制度规定，岁末年初(腊月 and 正月)择吉日封印、开印，一般在腊月二十前后封印，正月二十前后开印，期间为官员年假时间。在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亦如是绘画，均从第六、第七册同一画面“拷贝”而来，但第六、第七册所绘的礼节时间是在腊月与正月，需要有封印开印告示，与前面这两册不同。2. 题签、图像绘制与档案记载不

〔图三十六〕进呈本第四册《皇后妆奁图》局部



〔图三十七〕进呈本第五册《皇后妆奁图》局部



〔图三十九〕进呈本第五册《皇后妆奁图》局部



〔图三十八:1〕吉祥如意款粉彩岁朝婴戏图大盘正视图



〔图三十八:2〕吉祥如意款粉彩岁朝婴戏图大盘俯视图



〔图三十八:3〕吉祥如意款粉彩岁朝婴戏图大盘底款图



一致。第四册《皇后妆奁图》，二十四日走到保和殿东侧后左门附近的妆奁队伍中，黄签所写为“金点翠红白玛瑙桂花盆景成对、红碧玺玉堂富贵盆景成对”即为四件，而画面实际绘为两件带玻璃罩的盆景〔图三十六〕。按例，清代的盆景多有玻璃罩，每件一个罩子，可证明盆景实为两件而非四件，并且光绪《大婚典礼红档》也记载为金点翠红白玛瑙桂花盆景一件、红碧玺玉堂富贵盆景一件为一抬。二十四日进妆奁，按照光绪《大婚典礼红档》的顺序，应有黄地五彩瓷百子盘，但第五册《皇后妆奁图》，走在太和门东侧昭德门台阶上，却错绘为一对插有谷穗戟磬的五彩瓶〔图三十七〕。此类黄地五彩瓷百子大盘，故宫博物院尚有遗存〔图三十八〕。太和门东侧昭德门台阶下的妆奁，黄签上写“翡翠荷叶洗一件”，实应为盘，其内盛有寿桃清晰可见；写为“青玉葵花洗一件”，也应为碗，其内亦盛有寿桃〔图三十九〕，档案亦记为碗。此外，黄签还有错字一处，二十四日走在太和殿东侧中左门的妆奁中有郎窑大碗一对，把“郎窑”误写为“狼窑”〔图四十〕。3. 建筑细节不够准确。如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画面上，景山北部东侧、万春亭东侧蓝色的周赏亭本应为圆攒尖顶，却画成了八角攒尖顶；绿色观妙亭本应为八角攒尖顶，却绘成了四角攒尖顶〔图四十一〕，当然，这并不是画面的主体，不影响大局。4. 凉棚绘制有误。第八册《庆贺颁诏筵宴礼节图》上，太和殿丹陛下卤簿外东西侧的蓝布凉棚均应为八座，但西部多绘了一座成了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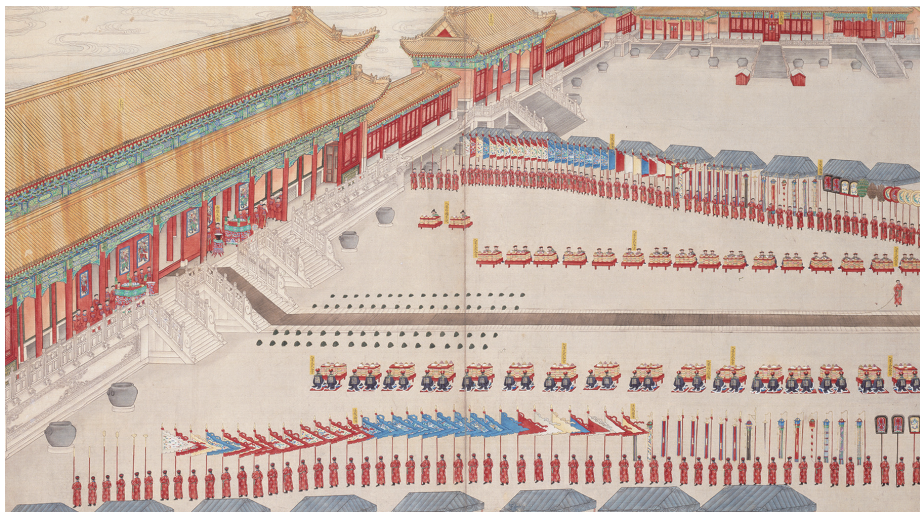
〔图四十〕进呈本第四册《皇后救夜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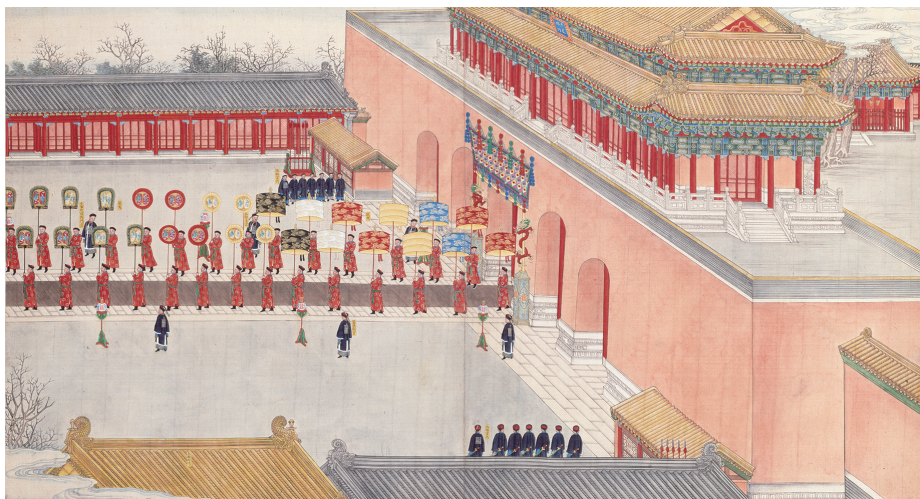
〔图四十一〕进呈本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四十二〕进呈本第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



〔图四十三〕进呈本第六册《册立奉迎图》



座〔图四十二〕。5. 卤簿绘制个别有误。第六册《册立奉迎图》所绘皇后仪驾，在端门门洞外多绘了二柄红色九凤盖，第一组实为红色方伞之误〔图四十三〕。

三套《大婚图》中，有一个画面笔者认为绘制的重大失误。新187874号与故5887号的第八册《庆贺颁诏筵宴礼节图》庆贺礼画面，在太和殿丹陛之下朝贺人员，绘出了三组，虽题签仍是“行礼文武各官”，但与第六册《册立奉迎图》“行礼文武各官”不同。朝贺时，丹陛下的官员均是按文东武西，再按品级以两翼方位排列，即两个方阵，此处却绘出三组的阵容，并且中间一组人员居然还是在御路

〔图四十四〕细稿本木板 故5886



〔图四十五〕进呈本木板



之上，实在属于僭越，不合礼法。故5886号在绘制时可能有所察觉，试图予以更正，但又似是而非，在第六册册立奉迎礼时太和殿丹陛之下朝贺人员绘制成了三组，第八册庆贺礼时太和殿丹陛之下朝贺人员绘制成了两组，只能说这一套的第八册绘制准确，但第六册绘制失误。

三套《大婚图》，每册外均为楠木夹板，但前两套稿本夹

板正面只是刻以阴文题签，其题签文字与文字外框凹槽涂以绿色〔图四十四〕。正本夹板正面亦刻以阴文题签，但其文字涂以金色，并在题签外框以及册面外框上饰以涂金的云龙纹〔图四十五〕。

只有明晰了三套《大婚图》以上各处的不同，以及绘制出现的问题，才可以正确理解大婚的礼仪程序。否则，任意取用一套，既会对大婚程序理解有偏差，也会因其中绘制的细节导致读图出现其他方面的误判。

三 《大婚图》册的绘制过程

《大婚图》上并无作者款识，但首册《懿旨》中节录了慈禧太后有关光绪帝大婚的主要懿旨，这是解读《大婚图》册的重要线索。关于此图的作者、绘画时间，在此均有简单记载。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三日，“总管连英口传奉懿旨：皇帝大婚应行各项礼节，着派内务府员外郎庆宽，自皇后出宫起，至典礼庆成，按照礼节次第，敬恭谨绘图册，先将图稿贴说呈览，后邸图式著一并绘图贴说呈览。钦此。”^{〔1〕}同时，相关档案中亦能找到相应的记载予以印证。该图是由参与皇帝大婚礼仪事务的内务府员外郎庆宽领衔，画馆的众多画匠共同完成；此图在皇帝大婚礼之前即已画成底稿，在大婚之后陆续修订完成细稿，至光绪十七年七月，正本全部绘成。此后，内务府总管大臣福琨、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于七月十四日联名为庆宽请求奖叙：“大婚典礼全图告成，恭为呈进事。窃奴才等前奉懿旨，派员外郎庆宽将大婚应行各项礼节按照次第敬谨恭绘。钦此。当经该员恭拟底稿，先将样本陆续分页呈进，均荷慈览，照式恭绘在案。现今正本一律告成，自指立皇后出宫，迄至典礼庆成，均已绘画成图，随辑图说，并将历次钦奉懿旨恭录一册作为首册，共装裱册页九本，分盛二匣，恭折呈进。再据该员禀称，遵旨恭绘图册二

〔1〕 《大婚图》首册《懿旨》，故宫博物院藏。

年有余，共用过工料银九千五百余两，该员因屡荷慈恩，情殷报效，恳请免发此款，稍尽微忱等情。伏查该员绘此全图将几三载，尚能详细讲求勤慎将事，兹又报效工料款项，情出至诚，自应代为恳恩俯允所请。惟该员辛勤三载，不无微劳，可否酌加奖叙之处，出自皇太后格外慈恩，为此恭折，谨奏请旨。”¹¹

如此大规模的绘制宫廷类图画，先期起稿本、次绘细稿呈览、最后绘制正本是基本流程¹²。我们通过文献考察其他的宫廷绘画，亦可作为旁证。如乾隆帝为其母六旬生辰祝寿，命画家所绘四卷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的一则档案，为我们揭示了事前预绘，然后进行修订的事实。在绘制的过程之中，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副领催六十一持来员外郎郎正培押帖一件，回溯在庆典之前，乾隆帝就已令画家相度地势：“内开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郎正培面奉上谕：于初八日着丁观鹏、张镐随驾至万寿山起，至于寿安宫止，往看一路陈设等件，绘图四卷。钦此。”¹³乾隆帝母后崇庆皇太后生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前十七天，皇帝就带领画家前往皇太后从清漪园万寿山至紫禁城内寿安宫的途经路线视察陈设——即为庆典所搭建的点缀景致，称为“点景”，目的是为了画家在事后绘制时更为准确。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如意馆档载：“八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押帖一件，内开本月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将如意馆现起《万寿图》稿手卷四卷，着瑞保先代(带)去第二卷、第四卷，或四人画一卷，或五人画一卷。先着每人画一段，各粘名签呈览，好的指名留用，不好的另挑人画来呈览。其余二卷稿，俟准时发去。再，应画手卷画绢四卷，俱着代(带)去。钦此。于八月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苏州织造瑞保送到《万寿图》画稿十四段，随人名签十四个持进，交太监张永泰呈览。于九日太监张永泰传旨：准吴维乾、徐大年、顾方乐、顾鹤琴、何文起、赵丹洪六人画。钦此。于闰九月二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苏州织造瑞保送到《万寿图》画稿三十二条，各随人名签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陈兆龙、陈维德、沈心诚、沈赓载、陈云藻、杜友美、江运昌、张仲超、徐周望、马兰生、袁文彩、李南备、许瀛洲、范章蘅、曹东来、胡大振、戴士宏、陈鹤坡、吴玉行、徐兰圃、徐光裕、朱彩文、王焕章等二十三人画，钦此。于二十二年六月一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本年五月三十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将张廷彦画得《万寿图》第三卷画稿呈览，奉旨：着张廷彦即画此第三卷。将从前发去苏州织造安宁处画绢四匹内作速要一卷来画。钦此。”¹⁴即丁观鹏、张镐在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所绘或记录的是关键性节点的局部稿，二十一年六月如意馆起《万寿图》稿手卷四卷当为全面的“底稿”，吴维乾等六人与陈兆龙等二十三人所画应为对照底稿再画的

〈1〉 奏案05-0979-004《奏为员外郎庆宽恭绘大婚典礼全图告成可否奖叙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前引乾清宫《西暖阁陈设档案》记载，此图册甫一绘成，即于光绪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存贮到乾清宫西暖阁。

〈2〉 聂崇正：《新见〈康熙南巡图〉第六卷残本考》中亦言：“按照清代宫廷绘画创作的制度及惯例，凡是绘制重要的作品时，画家必定先要画出草图，并且需经由皇帝御览过目，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绘制正图。”《文物》2013年第8期。

〈3〉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页389，如意馆，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九，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相同版本不再注明编者及出版单位)。

〈4〉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如意馆，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页671。

“细稿”。档案中也有越过“细稿”阶段直接到正本的记载。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一日员外郎郎正培奉上谕，安宁已请圣祖仁皇帝《万寿图》卷仿画。此卷不必起细稿，其大驾卤簿并法驾卤簿俱照旧卷上酌量仿画。钦此。”^①康熙帝与崇庆皇太后的《万寿图》中均有卤簿，因后者可以照前者仿画，所以无需再画“细稿”，直接绘制正本。

有关绘制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的几则档案，为我们揭示出鸿篇巨制的纪实性宫廷绘画作品从关键性节点的局部稿到全面底稿再到细稿的绘制情况。但其所绘并不是真正的典礼，主要是点景的热闹场面。而《大婚图》所绘，各个程序皆为礼典明则，必须符合礼制规定，较之《万寿图》更加不能掺有画家的创作。按下面所揭文献，《大婚图》必是在庆典之前演礼之时即开始草拟勾画底稿。所谓演礼，即古代凡关乎典礼的活动，为确保进程庄严不紊，往往在典礼之前进行练习——如同今日演出的“彩排”。即使年年都进行的坛庙祭祀，以及频次很高的为皇太后上徽号典礼、祭陵，清朝亦均举行演礼。如雍正七年“谕礼部：坛庙之中，最宜严肃。闻祭祀之先，即在坛庙中演礼。虽意在娴熟礼仪……寻议，谨查天坛外围墙内凝禧殿，原系预备演礼之所。嗣后各坛庙祭祀，应令执事等官，仍照旧例，于前期二日，赴凝禧殿演礼”^②。光绪二十年八月“以恭上皇太后徽号，诣慈宁门外率领王公大臣等演礼”^③。关于祭祀皇陵演礼，文献亦有明确记载^④。皇帝大婚在清代也算是旷典，清初到光绪朝两百多年间，也只有四次，不进行演礼，恐难礼仪娴熟。尽管官书未见载有此次大婚演礼，但事实应该存在。如下条档案可印证典礼之前已经开始绘制图册：“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奉王爷谕：皇上大婚礼次第礼节全图，著归并画馆恭绘，至所需款项由粮饷处支领。谨查恭绘大婚典礼全图，将《出宫图》、《纳采图》（以下有几字被虫蛀缺失）……图稿已先后呈览，奉懿旨着照图稿恭绘。用绢画正册，楠木板册面刻签，钦遵在案。又续绘《册立奉迎图》及《筵宴、受贺、颁诏》等图，现将图稿绘齐，俟托裱妥时即行呈览，阅后再预备呈览。今将绘妥《出宫图》正册，谨呈钧阅，并请示题说一节，拟用黄绢书写，至图上所贴黄签，可否写在图上，勿庸粘贴之处未敢擅便，伏候批示遵办。”^⑤即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指立皇后之前一日（初四日），《大婚图》册的《纳采图》稿等已由皇太后御览钦准后开始照图稿正式绘画；《册立奉迎图》及《筵宴受贺颁诏》等图稿也已绘齐，等待托裱完竣后呈览；《出宫图》已绘妥正本。皇后还没指立，真正的典礼还未举行，如何能凭空绘制这样大规模的图册！这必然是对演礼情况的描摹。所以，不论指立的皇后是谁，其府邸在哪里，皇后出宫必须走神武门、地安门；纳采、大征礼，以及进妆奁，皇帝不出场，只能出协和门、

①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如意馆，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三，页715。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七七，七年正月，甲寅。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六，二十年八月，丙辰。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陵寝赞礼读祝各官，应令掌关防郎中酌派轮班来京，交太常寺堂官教演礼仪；卷二〇四：每年太常寺堂官奏请赴陵演礼。至盛京礼部，系专办三陵祭祀事务。平时赞礼郎虽在署演礼，但陵寝祭祀，大典攸关，请敕盛京礼部，令赞礼郎等每月齐集衙门数次，照陵寝大小祭祀礼演赞。如遇福陵、昭陵大祭，就近派侍郎或司员豫期前往视牲演礼。

⑤ 旧整《宫中杂件》第238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东华门；册立奉迎，只能走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皇后入宫，走这样反向的路线，直至乾清门。

皇帝大婚筹备时间，于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即已开始：“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由内阁钞出，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皇帝大婚典礼崇隆允宜，先期预备一切应办事宜，着派总管内务府大臣遵照《会典》敬谨办理。”^①接着，当年五月开始成立大婚礼仪处。在成婚之前这段时间里，遵照《会典》筹备所有应行事宜，为了这旷日盛典，不能不进行演礼。《大婚图》底稿本在皇帝大婚之前已经绘制完成，后来的细稿本应该只是对照正式典礼进行修订、完善。至于《大婚图·懿旨》册节录慈禧皇太后的这条懿旨^②，主旨在于明确出宫图与正式典礼的各个程序图画等同处理，即《皇后出宫至邸第图》本不属于大婚礼的程序，也纳入本图册而非单独装帧。此条懿旨于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四^③亦有记载。

以上所谓的“皇后出宫”，是缘于清代后妃的选立——选秀女制度。清代通过对满蒙汉八旗（共二十四旗）适龄女子“普选”秀女，合格者在户部记名，待到皇帝成婚的年龄再把户部记名的秀女提前召入宫中进行覆选，从中指立皇后与妃嫔。被指立的皇后与妃嫔，要先从皇宫回到母家府邸，等待举行一系列婚前礼仪后才能迎娶入宫。所以，在指立了皇后与妃嫔以后，要把“准皇后”护送回母家府邸——即“皇后出宫”。光绪皇帝指立皇后与妃嫔的时间，是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当日在符合条件的三十一个记名秀女中进行覆选^④，最终选得叶赫那拉氏（慈禧皇太后弟弟桂祥之女）为皇后，他他拉氏（礼部侍郎长叙之女）姐妹两人为嫔，即后来的瑾妃与珍妃。

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之前，《大婚图》主要底稿已经绘成，接下来“奉王爷谕：皇上大婚礼次第礼节全图，着归并画馆恭绘”，即由画馆诸人共同绘制细稿以及正本。这里的画馆是否就是清宫的如意馆，尚难以定论，因在其他文献与档案中均未见画馆之名。

上面所引档案中虫蛀的几字，应该是《进妆奁图》。由于《大征礼图》在画面上与纳采礼无太大差别，所以并未提前画底稿^⑤，我们看到遗存的实物《大征礼图》册就是《纳采礼筵宴图》册中纳采礼部分的翻版。大征礼本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举行，而其图稿则是在大征礼后一个多月才呈进给皇太后，这个图稿应为其细稿本。因为大征礼图与纳采图场景、程式基本一致，只有给皇后的礼物较之纳采为多，另外增加了皇后父母的赐物，所以，无需提前绘制底稿呈览。这种情况也有前例可循，如前面所引崇庆

① 《大婚图册·懿旨》，故宫博物院藏。

② 懿旨曰“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三日，总管连英口传懿旨，皇帝大婚应行各项礼节，着派内务府员外郎庆宽自皇后出宫起至典礼庆成，按照礼节次第敬谨恭绘图册，先将图稿贴说呈览，后邸图式著一并绘图贴说呈览。钦此”。

③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宫中杂件·后妃·人事》第125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一，“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呈览《大征礼图》稿，奉懿旨照图恭绘。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皇太后《万寿图》仿画于康熙帝《万寿图》上的卤簿。

正本《大婚图》册，图说各开确实是按档案所说用黄绢书写，但对典礼当时的供职人员、所用器物等标注，仍是采用贴黄色绢条缮写的题签形式，而没有按奏折所请示的直接写在图上。贴黄签比直接写在图上更有灵便可操作性，不会因注错一个字而破坏整个画面，粘贴签条非常便于替换，这恐怕也是后来皇太后没有允准直接把黄签书写在画面的原因。

在绘画《大婚图》册的空间范围上，慈禧太后也作了原则性的指示，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总管连英口传懿旨：“恭绘大婚各项礼节图册内，无庸绘画内廷礼节。”^{〔1〕}内廷礼节包括皇后在乾清宫跨越火盆、进入坤宁宫跨越马鞍，以及在洞房内合卺的所有礼节，缘于这些礼节属于宫闱隐秘，不可示人，故而略去不画。所以，《大婚图》册上的画面主要集中在外廷以及宫外。

由于《大婚图》册的绘制是在大婚典礼之前即开始绘画稿本，而典礼有固定的程式，要使画面绘制符合典礼的各个场面，画家必须有所参照才不会出现些许乖谬，因而大婚礼仪处要求对图册中所涉及的典制用器与排列顺序等，由相关机构提供标准图样、次序、件数参照，所以此图的准确性毋庸置疑。其中，对于能够张扬皇家威严的卤簿仪仗，更是必须绘画得准确无误。为此，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大婚礼仪处先向乐部行文：“前奉懿旨，派员外郎庆宽恭绘大婚典礼各项礼节图册，即将册立奉迎日，皇太后升慈宁宫受皇帝礼，应该乐器处所及乐器名色、次序、件数，及皇上御太和殿遣使时应该乐器处所，及乐器名色、次序、件数，并凤舆、前导乐器名色、件数，及行走次序分析开单，咨送本处，以凭恭绘可也。须至片者，右片行乐部。皇太后仪驾、太和殿遣使时应设法驾卤簿、步辇、五辂、驯象、仗马等项名色、次序、件数，皇后凤舆仪驾、凤舆前黄盖、御仗、册宝亭、仪驾行走排列次序开单咨送礼仪处，幸勿漏误。”^{〔2〕}至十二月十五日，大婚礼仪处再次向工部行文：“前奉懿旨，派员外郎恭绘大婚典礼各项礼节图册，所有仪卫一切式样，必须遵照定制绘画，方昭详慎，相应片行贵部，希将皇太后仪驾、皇帝法驾卤簿、皇后仪驾著色全图各一份，即日咨送本处以凭恭绘，用毕送还可也。”^{〔3〕}因此，在绘画大婚图的各个部分时，庆宽一班人并不能有多少“创作”的成分，只能是临摹图样，按卤簿仪仗的实际排列次序合理安排画面空间而已。从记载上看，还没有发现哪一幅清代纪实性绘画如此地纪实。

庆宽作为掌管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员外郎，按《大婚典礼红档》记载，他几乎参与了大婚的全过程。复选秀女结束，“准皇后”回到府邸后，他就被派到皇后府邸轮流值班，以备随时听差。在奉迎皇后前夕演礼以至真正的奉迎，他均在凤舆前步行恭导；福晋们在向凤舆中安放“龙”字轴与如意时，他与内务府官员庄健、锡恒等进行“照料”，凤舆前执打的灯只也由他来照料。奉迎时他的妻子也在参与料理^{〔4〕}。

〔1〕 《大婚图》之首册《懿旨》，故宫博物院藏。

〔2〕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三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三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均散见于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各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庆宽在皇帝大婚前已经接到绘画皇帝大婚图的旨意，因而，在他所参加的大婚礼各个环节上，一定要备加留心，以便对前期所画底稿本进行修改完善，指导其他画匠。因为一般画匠并无资格参与皇帝大婚典礼，他们所绘稿本就会在一些细节上出现偏差。作为领衔画家，对画面纠偏匡正责无旁贷；而且每画一部分底稿，都要依次向醇亲王奕譞与慈禧皇太后呈览，即“当经该员恭拟底稿，先将样本陆续分页呈进，均荷慈览，照式恭绘在案”，画匠们来不得半点儿疏忽。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套大型画册上，所绘皇帝形象并不突出，只是画有光绪皇帝到慈宁宫向慈禧皇太后以跪姿行礼的画面。这与清盛期所画的几幅大型纪实绘画不同，如康熙帝、乾隆帝《南巡图》，雍正帝《祭先农坛图》等，在绘画了宏大卤簿仪仗以后，总是有一部分要着重突出主人公——皇帝的高大形象。这或许是与不同时期的皇权形式相关。康乾时期，是清代皇权最为巩固时期，皇权皇位一体，在气势磅礴的画面上，给人以皇权震撼的，也正是皇帝本人。而在清晚期，尤其是同治、光绪时期，出现了皇权与皇位相脱离状态^①，即拥有皇位的皇帝，却未能执掌权柄，皇权则掌握在没有皇位的慈禧太后手中（光绪七年前为形式上的两宫皇太后慈安与慈禧共同掌握，两宫垂帘听政）。那么，宣扬皇权与皇位就出现了偏差。在《大婚图》册上，显示出的正是赫赫皇权。不仅在《大婚图》册中，用整整一册篇幅誊录的全部是慈禧皇太后的“懿旨”而没有皇帝的一条“谕旨”，而且，在绘制皇帝到慈宁宫向皇太后行礼的两幅画面，均未采用其他所有画面所用的常规对开形式，而是采用了巨大的幅面，纵130厘米，横114.5厘米（此为故5887号尺寸，另两套尺寸略异，但装裱形式与此册相同），四面折叠，插在册中，形式极其特殊，这或许正是宣扬皇太后强权的意义所在。此外，在奉迎皇后凤舆中的御笔“龙”字轴，并不是光绪帝御笔，而是慈禧皇太后御笔，上面钤印“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

四 《大婚图》册的作者庆宽

领衔绘制《大婚图》册的庆宽，画史无传，经考其生年为咸丰元年（1851），卒年不详，隶内务府汉军旗籍。

庆宽走入皇宫任职，最早见其曾参与修建同治帝惠陵。光绪三年在对参与工作人员奖叙时有：“庆宽着俟补主事，后以员外郎遇缺即补，先换顶戴。”^②五年再次奖叙诸多官员时，其中“庆宽着免补主事，仍以前保员外郎，遇缺即补”^③，并未补上六品的主事，仍是员外郎。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关于置办大婚皇后仪驾内应用驾衣事的札文，在大婚礼仪处醇亲王奕譞与总管内务府大臣福琨等人落款

① 杨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

② 《清德宗起居注》卷六，光绪三年九月二十八。

③ 光绪朝《上谕档》，五年闰三月初四。

之后，还有“承办司员”庆宽等十人，说明此时庆宽已经开始介入到大婚典礼的承办事务之中^①。但到光绪十四年十月筹备皇帝大婚之时，其身份仍是内务府员外郎，见前引《大婚图》中皇太后懿旨。内务府员外郎身份很低，无品级，庆宽于光绪三年曾候补六品主事一职，但不知为何没能晋职。可是，当皇帝大婚刚刚举行过合卺礼，庆贺颁诏礼尚未及举行之时，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一日，醇亲王奕譞就《呈大婚典礼始终格外出力司员八员衔名清单》，请予奖叙人员中，其上首列“武备院卿衔即补郎中员外郎庆宽，请赏在任，以道员选用并赏加三品顶戴”^②，即在光绪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正月间（不知具体何时），已授庆宽武备院卿衔（即三品顶戴），可以即补郎中，醇亲王奕譞为其请赏待授为实职的四品道员，并让其享受三品的“待遇”——赏加三品顶戴。惜请赏未获钦准。光绪十七年二月，引见内务府三院等机构京察^③一等人员时，庆宽与庄健等二十二人给予军机处记名^④，以关差、道府用^⑤。同年五月，“以绘图出力，予员外郎庆宽军机处存记”^⑥。前引档案同年七月十四日，内务府大臣福琨等联名庆宽请求奖叙之后，十九日再次请旨“……奉懿旨，庆宽着交内务府核给奖叙。钦此。遵查，庆宽现系臣衙门广储司员外郎，递保至存记道花翎三品顶戴即补郎中，官阶无可加保，可否赏换二品顶戴，出自慈恩，为此谨奏”^⑦。经过福琨等人为其请功，其待遇由三品顶戴升为二品顶戴，一直维持到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之前，但仍未落实十七年二月引见后拟实授关差、道府之职，还是虚衔“花翎二品顶戴，军机处存记道随带加二级即补郎中一等记名”，其实际职务仍是内务府“银库员外郎”，到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慈禧皇太后才懿旨“员外郎庆宽著以三院卿题奏”^⑧。三院即内务府武备院、上驷院、奉宸苑，三院卿为三院中某一院的长官，官正三品。

庆宽正待晋升三品实职之时，却有人揭发了他的不良身世。当年五月“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内务府员外郎庆宽，本非旗人，身家不清。同治年间，曾充崇文门监督验货家丁，冒入内务府汉军旗籍，蒙捐员外郎，兼银库差使。又派总办各要件，盘踞把持，于应发库款，必密令扣出息银，勒令出具甘结。侵蚀干没，不能以万数计。招摇纳贿，百弊丛生。请飭查办等语。’着派徐桐、敬信，按照所参各节，严

① 奏案05-0960-024：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关于仪驾内应用夹驾衣事的文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奏案05-0967-043：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呈大婚典礼始终格外出力司员八员衔名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京察，是明清定期考核官员的制度。明代每六年举行一次。清代吏部设考功清吏司，改为三年考核一次，在京的称“京察”，在外地的称“大计”。

④ 记名，指清代官吏有功绩，交吏部或军机处记名，以备提升。

⑤ 《清德宗实录》卷二九四，十七年二月，辛亥。

⑥ 《清德宗实录》卷二九七，五月，壬申。

⑦ 奏案05-0979-010：光绪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奏为员外郎庆宽请赏给二品顶戴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⑧ 光绪朝《上谕档》，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密确查，据实具奏，不准瞻徇情面，曲为开脱。原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①参奏庆宽的是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钟德祥。六月查办结果是：“经徐桐等调查该旗户口册及一切案卷，核对庆宽出身年岁，及伊母姓氏年岁，均属不符，是其身家不清；冒入旗籍，不为无据。该员任银库七年，为时甚久，新居精丽，炫人耳目，且有发款扣利之事，以致物议沸腾，显有包揽营私情事。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即革职，销除旗档，并著步军统领衙门，将该革员房屋财产查抄入官，以示惩戒。”^②前引档案中有庆宽绘制《大婚图》共用过工料银九千五百余两，其“情殷报效，恳请免发此款”。以他二品顶戴的俸禄，“年薪”不过一百五十五两而已，居然九千五百余两不仅先期垫付，而且不需朝廷报销，或者贪墨，或者极为精明有经营增利。

关于查抄庆宽之家，清人陈恒庆所著《谏书稀庵笔记》记载最为详细：“光绪间，查抄内务府银库郎中庆宽时，予正在京，知之甚悉。是日晨，福相国（即指内务府大臣福琨）箴廷奉密旨，前往查抄，带领提督衙门司员吏役，直入庆宽家。先封大门，其家男丁则禁之于外空屋，女眷则禁之于内空屋。福相国则坐于厅事，飭司员带吏役，按房查抄。抄出贵重之物，则堆积于厅事院中。至女舄儿袴，及器皿等物，弃之弗顾。检查各房已毕，又飭役赤身缒入井底探之。役恐灭顶，甫入水，则高声报曰：‘无物’，即缒而上之。更可笑者，复入其厕，司员掩鼻，飭役以杆略探之，报言无物。皆出至厅事，将贵重之物一一登记。福相国乃进内覆命。吏役督守物件，监视大门，不敢远离。凡查抄之事，皆派九门提督前往。福相国正兼此职，并充内务府大臣。人极忠厚，且素喜庆宽之当差明敏。其得罪之由，由于内监冒领物件，严禁弗予，内监恨之，为造蜚语。福相国奉命之后，已暗通消息于庆宽，先将银券契约细软等件，自后门运出矣。相国覆命后，奉旨庆宽赦免，单开之物，由官变价，房屋入官而已。又迟数年，复庆宽官职，且外放道员，旋升臬司，家富如旧。”由此亦可知清代抄家情状。此处又言庆宽因得罪太监而被抄家。

关于银库官员包括庆宽之贪污记载，并非孤证，又见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敬佑奏：“传闻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经户部筹拨协济，每年进款百余万两仍不敷用。奴才查访银库库账，王伯平即庆成，祁芝山即文瑞，勾结库官，始而庆宽等，继而恒起等，舞弊招摇……各省关报解内务府饷银……多索交费……应将饷银收入银库……抬至钱铺，声言归还外间借欠，银库久成虚设。而库账与库官勾结在外，私放渔利，且在饭馆酒肆开放领银……”^③其渔利手段可谓多端。类似的文献亦见于《清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四《国用》考二，只是这里提到库账勾结库官，未提庆宽之名，其所记舞弊之情与光绪朝《东华续录》完全相同。

清人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记载庆宽服侍过慈禧：“内务府郎中庆宽伺候慈宫，颇见信用。有一

① 光绪朝《上谕档》，二十年五月二十日。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二，二十年六月，癸丑。

③ 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三〇，二十一年十月，己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日，德宗因慈寿要送礼，乃告庆宽曰：‘我要送太后寿礼，汝为我备之’……庆宽办理太后六旬万寿庆典，设有庆典处，所有应用器物，均由其包揽，殆尽抬价居奇，从中取利。且其气焰咄咄逼人，旗人多忌之。嗣有满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及诬其身家不清等事……顷已派中堂前往抄家矣！抄数日，得银三千余两，他无违禁之物，而庆宽遂以落职了案。后太后重复训政，庆宽不知如何作用，又部选江西盐法道。”^①

看来，因庆宽服侍慈禧而“颇见信用”，所以，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后，他又东山再起，十月“又谕：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庆宽并准其入内务府汉军旗籍。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考察商务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②。由其“自备资斧”可知，在内务府大臣福琨庇护下的查抄，因转移“银券契约细软”等并未伤及庆宽家资根本。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人回国，“电寄刘坤一：刘学询、庆宽现由日本差竣回沪，着刘坤一传知该二员，即行回京覆命，先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报到”^③。庆宽回国后，还条陈六项建议由总理衙门代为向上奏闻。九月“着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逐条酌核，择其可见施行者详细妥议具奏，听候采择。寻奏：庆宽所陈兴学理财各条，分别准驳，期于可见施行。至其请设六政局，派大臣参议等员，总以亲贤，朝廷自有权衡，非臣等所敢擅议。得旨：依议”^④。十月“又议覆庆宽条陈一折。所有日本学校等六政详细章程条例，即着李盛铎就近考察咨取，以备采择。其整顿财赋条内，拟制造银币一节，事属架空，恐多流弊。应俟银圆一律畅行后，再行体察情形，奏明办理”^⑤。清人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则记载庚子国变，“梁启超亦走保日本，使刘学询、庆宽并刺之，无所成而返。”以为刘学询、庆宽为刺杀梁启超而赴日本。此条记载，其真实性难证。

庆宽可谓善为营取财利之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候补员外郎庆宽报効饷银一万两，着赏收，户部知道。钦此”^⑥。二十七年，庆宽随同办理《辛丑条约》议和事件，由此可知其亦有政才，经庆亲王奕劻保奏，可接算前俸^⑦。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谕军机大臣等：候选道庆宽着仍以道员即选”^⑧，是其职位可升为道员，可以成为正四品实官。但在实际补缺中，庆宽仍是补为员外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奏为补用员外郎等缺事》：“总管内务府谨奏为补用员缺事：臣衙门出有员外

① (清)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一，二十四年十月，癸未。

③ 《清德宗实录》卷四四九，二十五年八月，辛卯。

④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〇，二十五年九月，丙辰。

⑤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三，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⑥ 光绪朝《上谕档》，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⑦ 奏案05-1044-069：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奏为开复员外郎庆宽可否接算前俸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⑧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八，二十九年六月，乙丑。

郎一缺，轮应补用人员到班。查有候补员外郎庆宽，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六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面奉旨：开复员外郎庆宽，着遇有员外郎缺出即补。钦此。现悬之缺即请以庆宽补授……”^{〔1〕}光绪二十九年溥伦赴美国观赛会，曾差使庆宽同去：“交赛会大臣溥（伦），本日贵大臣奏拟调东文翻译折，又奏庆宽、祝瀛元请开去赴美差使片，均奉旨依议。钦此。”^{〔2〕}但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呈京察官员等第职名清单》上，可见庆宽还是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员外郎^{〔3〕}，仍未实授为四品道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呈带领引见京察一等官员各员名单》中开列三十人，其中庆宽列名职衔为“赏戴花翎二品顶戴选用道题奏三院卿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员外郎庆宽，食俸十年，年五十五岁”^{〔4〕}。此档案页面天头处，注有“朱笔圈出”，即三十人中有二十七人“朱笔圈出”，实为皇帝钦准，并且他与锡麟、械兴、文淇等四人贴有黄条标识，应是预备尽早升转之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庆宽等二十七人才得以引见，“均着交军机处记名以关差道府用”^{〔5〕}。其引见考察评语为“由官学生出身，年五十五岁，才具优长，精明干练”^{〔6〕}。

在以上光绪三十二年的《呈京察官员等第职名清单》《呈带领引见京察一等官员各员名单》两份档案中，均记载庆宽五十五岁，推算其生年在咸丰元年（1851），并知其出身为官学生。但光绪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奏为京察一等人员带领引见事折》^{〔7〕}上，记载庆宽当年三十八岁，由此推算其生年则在咸丰六年。但此件档案之年岁不可信以为真，应以咸丰元年为真。因其在光绪二十年五月御史钟德祥参奏之前的身份信息瞒报，六月经徐桐等“调查该旗户口册及一切案卷，核对庆宽出身年岁，及伊母姓氏年岁，均属不符”，经过此次调查更正了其身份信息，故而在二十年六月以后档案中所记其身份信息可信。另有一项佐证材料。光绪十五年皇帝大婚之时，内务府呈报参与大婚典礼官员妻子年岁中，庆宽之妻年四十一岁^{〔8〕}，即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庆宽生于咸丰元年（1851），长庆宽三岁，比较符合实际。如若庆宽生于咸丰六年（1856），则其妻较之年长八岁，不太符合中国封建时代的婚配习俗。

又据民国佚名著《贪官污吏传》所载，庆宽“本名赵小山，幼即研究画术。及长，益工，尝绘《颐和园全图》，为醇贤亲王奕譞所赏，即进献孝钦后，后亦以为美，赏给二品顶戴，与管幼安之绘孝钦相而得奖同。已而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库。”因其得罪太监而被太监授意某御史纠参，终至获罪被查抄。其

〔1〕 奏案05-1037-035：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奏为补用员外郎等缺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光绪朝《上谕档》，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 奏案05-1046-020：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呈京察官员等第职名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奏案05-1046-024：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呈带领引见京察一等官员各员名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清德宗实录》卷五五六，三十二年二月，甲寅。

〔6〕 奏案05-1046-039：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呈在京官员覆带引见名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 奏销档846-047：光绪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奏为京察一等人员带领引见事折》。

〔8〕 《大婚礼来文档》，光绪十三年五月立，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十三年五月立”为其封面所题，即汇集光绪十三年五月以后的文案，因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慈禧皇太后开始下达懿旨筹备皇帝大婚。

后极意夤缘得复职，出任江西盐法道¹¹。此书所载，庆宽有绘画才能，与其获得醇贤亲王奕譞所赏，领衔绘制《大婚图》史实相合。如以此书为信，可知其最后的官职是江西盐法道员，亦与前引实录所载“以关差道府用”的道员相符。清人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亦载其终为江西盐法道。

综上，可见庆宽之沉浮。

绘画《大婚图》册，除了领衔的庆宽外，还有多位画匠参加，档案曾记载对画工工作的勤惰给予过不同的奖赏，“皇上大婚礼全图着归并画馆恭绘，所需款项由粮饷处支领。仅将画工扣罚银两，拟照上案分别勤惰奖赏银两数目开具钧阅：戴宾十二两、杨春辉四两、张立彬十两，皇廷桢四两、边庆丰八两、刘玉璋八两……以上共银九十三两”¹²。由此可知，戴宾、杨春辉、张立彬，皇廷桢、边庆丰、刘玉璋等人都是《大婚图》册的实际参与作者。而这条档案也只是记载了部分画匠。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档案与文献，结合《大婚图》实物，我们对该图的绘制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并且实证了纪实性宫廷绘画从稿本到正本的绘制流程。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对深入理解皇帝大婚典礼作为封建时代的一项重要嘉礼，亦甚有补益。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民国佚名：《清代野史丛书·贪官污吏传(外十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

〈2〉 旧整《宫中杂件》238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